

# 王光祈史学著译论略

侯德础

近年来，在中国新文化史上留下过深深痕迹的王光祈，作为五四运动时期有相当影响的进步的社会活动家和留德之后最早在欧洲荣获博士学位的中国音乐学家之一，中国近现代音乐学的先驱者和肇基人，在被漠视、冷落了多年之后，正越来越受到国内史学界和音乐界的关注。他的生平事迹、政治思想、社会活动和音乐生涯，正被重新讨论评价。但是王光祈的史学著译活动，似仍未受到应有的重视。早在三十年代，他的朋辈在追怀他的悼亡文章中，已肯定他“也是一个史学家”，“是有新史家的精神的”，“尤有西洋现代史家的科学精神”。<sup>①</sup>近年台湾音乐界在呼吁恢复“王光祈音乐奖金”著文中，也称“他是一个史学研究工作者，因为译介了一批具有史学价值的丛书”。<sup>②</sup>然而除却此种片语只言的结论，王光祈的史学活动及其史学著译的价值，历来乏人研讨，语焉不详。象国内新出版的《民国人物传》第三卷《王光祈传》，对其史学著译和史家地位竟毫无表述。有鉴于此，本文拟就王光祈的史学著译作初步的探讨，以管窥王光祈的史学思想、治史方法和译著的史学价值，为王光祈研究作一点拾遗补漏的工作。

## （一）

王光祈的史学著作和译作，集大成者是近代国乐史的杰作《中国音乐史》两卷

（1931年），以及所译《中国近世外交史料》七种，即《瓦德西拳乱笔记》（1928年）、《李鸿章游俄纪事》（1928年）、《美国与满洲问题》（1928年）、《三国干涉还辽秘闻》（1929年）、《辛亥革命与列强态度》（1929年）、《西藏外交文件》（1930年）、《库伦条约之始末》（1930年）。此外，他用德文发表的《论中国古曲歌剧》、《论中国诗学》、《千百年间中国与西方的音乐关系》、《中国耕地数千年间的统计》等论著，<sup>③</sup>用中文写作的《西洋音乐史纲要》、《各国国歌评述》、《欧洲音乐进化论》等书，他译的《国防丛书》中的《德英法战时税收》、《德国工役制度》，以及他《旅德存稿》中的一些篇章，也多少与史相关，有一定的史学价值。从二十年代中后到三十年代初期，短短几年功夫，他涉及史学的著译远在百万言以上。即使当今史家，有如此建树亦在佼佼者之列，何况他的史学著译至今影响不衰，所以王光祈在中国现代史学史上的地位，应是不容忽视的。

王光祈作为五四运动时期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赴欧后以音乐为专业，最早在世界上获得承认和荣誉的中国音乐学家，之所以能在祖国史苑卓有贡献，除了他坚持爱国主义思想，亟欲以史为鉴，唤起国人共御帝国主义侵略，也自有其兼治史学的渊源和条件。

他的祖父王再咸（泽山），是咸丰壬

子科举人，能诗善文，寓京教馆时做过后来相继督川的赵尔巽、赵尔丰兄弟的受业师傅。不过王光祈作为遗腹子降生时，门祚已衰，他在家乡温江当过牧童，“自幼是他母亲亲自教读，到九岁，才进本地的师塾”。④十二岁时，他受到新任川督、后来领衔编纂《清史稿》的赵尔巽的资助，到成都上学。赵尔巽还特地在学业上表示关切，“命他每周作文一篇交去，亲自给他改削。”⑤1908年，王光祈考入有名成都高等学堂分设中学丙班，该校校长刘士志（行道）先生，“是一位汉学家，同时又是提倡新学最力的”，他“律己甚严，淡泊明志，生不治家产，专以提倡学术，奖掖后进为能事。”刘先生在校执教历史，对于少年时代的王光祈来说，不仅是他“簿于自奉而勇于治学”的人师，也是他喜好史学，奠定国学根基的业师。⑥王光祈丙班同窗中，也很有些才识出众的人物，后来成为著名文学家和历史学家的就有李劫人、郭沫若、蒙文通等人。在辛亥革命前后历史大变革的时代，王光祈如饥似渴地吸收新文化、新思想，无论苦读和学业都在班上居于榜首。他愤世嫉俗，立志反抗封建统治，正直做人，以国家民族的复兴为己任。他积极参加过四川的保路运动，武昌首义消息传来，他和同学们不待四川宣布独立，就迫不及待地剪掉了象征腐朽和屈辱的发辫。然而1911年12月8日发生的成都兵变，却使他沦于赤贫的境地。他回到故乡温江，在清贫和苦闷中致力于中国古诗和经史研究。追溯他青少年时代这一段坎坷的经历，确实可以为他毕生为了爱国理想和学术钻研而“奋斗、实践、坚忍、俭朴”的顽强进取精神找到脚注。也不难发现，王光祈作为诗人之孙、史家弟子和未来史家的同窗契交，从少年时代即深受文史的熏陶，这对他以后在史学方面有所建树，的确提供了很好的环境

和素养条件。

五四以前，王光祈也有过一段史学工作经历。1914年春天，他由泸县乘舟东下，经夔门出川，辗转赴京求学。到北京后，由时任清史馆馆长的赵尔巽介绍，入清史馆担任书记员工作。同年秋，他考入中国大学攻读法律，课余仍在清史馆兼职，以所得报酬为学费及生活之资。他在法律各科中，“独喜国际公法，中西外交史，曾搜集外交部与各国所定条约档卷，详为披览，颇具心德。”⑦他平常省吃俭用，“每日只吃棒子面一大碗，聊取果腹。而治事作文终日不倦。”⑧为了广罗资料从事钻研，他却不惜倾囊以尽。据周太玄回忆，有一次他得着二十余元的收入，依理应寄给家乡的妻子，“但经过一夜的徬徨、寻思，最后他竟然买了一部商务出版的外交月报的全份”。⑨可以认为，王光祈供职清史馆和他对于中西外交史的悉心研究。使他对清末封建统治的反动腐朽，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凶狡，中华民族的深重苦难和危机有了切肤之感，这种认识对于他投身五四革命洪流，热心社会改造，对于他日后在民族危亡问题再趋尖锐的前夜，用心良苦地翻译若干种列强侵略华史料以惊醒国人，供同胞作反侵略斗争的参考，应该说是不无影响的。

## （二）

心系祖国的安危，力图以“先民文化遗产”，“引起民族自觉之心”，“陶铸民族独立思想”，⑩是王光祈治史活动的基本出发点。尽管留学德国后，他以音乐为专业，但他在1931年成书的《中国音乐史》自序中明确写道：他相信音乐作品“须建筑于‘民族性’之上”，“而最能促进‘国乐’产生者，殆莫过于整理中国乐史。”为了“创造伟大‘国乐’，侔于国

际音乐界而无愧”，他“个人终身学业。则只能以整理史料一事自励。”<sup>①</sup>他也是带着要为中国人争一口气的激愤为国乐修史的，因为“西洋‘汉学家’对于吾国近时学人。类多轻视，谓其缺乏普通常识，不解治学方法；现在中国人已无自行整理国故之能力，须西洋学者出而代为整理。”他不仅自己勉力为之，也切望国内学术界同志奋发图强，“能一洗此种奇耻大辱”<sup>②</sup>

王光祈在致史学家邵循正先生的信中，亦曾谈到自己翻译外交史料的初衷：

“仆之专业，系在研究音乐历史，惟以国民危殆之故，间亦拨冗翻译外交史料七种，以供国人参考”。<sup>③</sup>在他翻译《瓦德西拳乱笔记》等书的1928到1930年间，他所言“国民危殆”也并非虚言。1927年，国内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发动反革命政变，葬送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在人民的血泊中建立起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又把中国投入了空前惨烈的内战和分裂。同年仲夏，日本田中内阁趁人之危召开“东方会议”，制定所谓《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上奏天皇，扬言“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sup>④</sup>1928年夏天，日本国内和海外已有关于《田中奏折》的传闻。身在莱茵河畔的王光祈，心忧祖国内难未已，外患日亟，岂能坐视从容？所以在“未受任何国家、私人、家庭之资助，全恃卖文为活”，“健康十分受损”，“终日头痛”的情况下，<sup>⑤</sup>努力从事多种外交史料的翻译，“以左手抚头，右手作字，至痛楚无力时，工作始废。”<sup>⑥</sup>“而不愿自己陷于血冷之境地也。”<sup>⑦</sup>这个时期他译的七种外交史料当中，直接与满蒙问题有关者就有《三国干涉还辽秘闻》、《李鸿章游俄纪事》、《美国与满洲问题》、《库伦条约之始末》等四种。这些

材料均采自列强侵华档案和秘密文件，以及帝国主义分子“当时直接参与该役者之著述”，集中反映了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领土和权益巧取豪夺的鬼蜮伎俩。他们或合伙打劫，或独占鲸吞，或购买象李鸿章、张荫桓之类高官出卖主权，或煽动民族分裂，分割中华国土。王光祈认为，这些事件“固为吾国历史上永不可磨之污点”，

“更为吾国留下许多纠葛，均待加以解决，故此种外交史料，实为国人所应当特别注意者。”<sup>⑧</sup>他特别忧虑满洲问题“不但未曾解决而已，并且成为今日第二巴尔干半岛。稍一不慎，又将成为各种民族鲜血涂抹之地。”他预料“满洲今后势将成为群雄逐鹿之地”，“美国与满洲问题并非过去陈迹，乃系未来大事，尚望国人及早加以注意。”<sup>⑨</sup>他用历史来警觉现实，用屈辱来激励发愤，用侵略者凶狡的自供来惊起国人自卫防范。可见王光祈治史，不是仅为学术而治，亦非为沽名求利而治，而是以中华之振兴为出发点，为国家民族的兴亡而治。这样的动机和史德难道不应该予以首肯？

王光祈的史学观点，用他的话来说，是一种“进化”的观点，他认为“吾国历史一学，向来比较其他各学发达，但在事实上，亦只有‘史匠’，而少‘史学家’（如司马迁之流，乃系凤毛麟角）”。因为中国“只有‘挂帐式’的史书，而无‘谈进化’的著述”，就连近于言“进化”的《纪事本末》一类书卷，“亦只限于该‘事’之本末，而于当时社会环境情形，却多不作深刻探讨。”他认为“此与近代西洋治《历史学》者大异，譬如吾辈治西洋乐史，凡研究某人作品，必须先研究当时政治、宗教、风俗情形，哲学美术思潮，社会经济组织等等”。<sup>⑩</sup>王光祈这段话，自有其偏颇的一面。例如中国绝不仅有“挂帐式”的以《资治通鉴》为代表的

编年体史书，更多的还是以《史记》为代表的以人物为中心的传记体史书，封建王朝的正史《廿四史》就皆属这种体例，其编著者堪称“史学家”的当然也不止“凤毛麟角”。至于《纪事本末》一类书籍，其实也只是历史编纂的一种新体裁，它以纪事为主，“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sup>②</sup>编纂方法有所改进，而治史的观点、对象、内容则并未改变，这和王光祈所言“进化”应是有所差别的。王光祈所谓“进化”，以他在《西洋音乐史》等书用语涵义考之，是“发展”或“发展过程”的意思。所以他实际上是主张治史要综观事物的发展，研究某一事物，更要对该事物发生的社会环境进行全面深刻的考察，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去探索其原因。他还强调“吾人研究历史，最宜注意其转变变化之迹。”<sup>③</sup>这些主张都具有一定的辩证因素，无疑是正确的。

他还不满旧时史家以宫廷或“英雄人物”为侧重的“通弊”。抨击《清史稿·乐志》八卷，便以五卷“专载似通非通之‘台阁体’乐章文辞，而于有清一代盛行之昆曲京戏，则闭口不提。”认为“此种乐志，只能代表有清一代宫庙中之乐，不足以代表最近三百年来之中华民族音乐也。”<sup>④</sup>他在比较音乐史研究中的“英雄主义”与“时势主义”观点时谈到，前者“最喜于每代之中，拾出几个‘伟大作家’以作代表，而其余‘无名英雄’，则只附笔及之，或者竟自略而不述，而且对于当时环境背景，多不甚注意，仿佛‘伟大作家’皆系一些天生圣人，所有一切庄严灿烂世界，皆由此二三天才凭空创造出来的。”而后者“对于‘伟大作家’虽亦与相当重要地位，但同时对于环境背景，以及无名英雄，却极加以注意，不让伟大作家‘独出风头。”他认为“时势主义”更“科学式一点”。<sup>⑤</sup>这表明王光祈在历

史由谁创造这个根本问题上，是倾向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这是唯物史观的一个重要见解，也是王光祈长期坚持的民主主义思想在史学观点上的集中反映。

王光祈的历史观具有唯物和辩证的因素，但他并不是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五四时代，他在思想上兼收并蓄，杂揉了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等各派思想，而其主流是具有五四时代特点的中国式的空想社会主义。旅德之后，他又曾宣布自己“是孔子的信徒”。<sup>⑥</sup>表示欲以孔子提倡的“礼乐”来“处世治心”，以致于走到“音乐救国”的极端。这些主张当然是违背唯物辩证法的。但是否这就足以证明“他已经走向胡适提出的‘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改良主义道路”呢？<sup>⑦</sup>笔者对这个结论也不敢简单苟同。诚然，王光祈是在用西洋科学方法整理国乐史，而他整理乐史的目的，是要效法意大利民族独立运动中创制著名《加利波的曲》的爱国诗人麦堪梯尼，创造“伟大国乐”来“引起民族自觉之心”，“陶铸民族独立思想”。<sup>⑧</sup>这固然有不切实际的空想的一面，但和胡适“整理国故”欲把人们的注意力由国事引向书斋，钻故纸堆考据训诂，研究和尚佛经，消磨斗争意志，似不应简单类比。他希望社会改良。他的“少年中国”乌托邦理想中也确有不少改良主义的因素，但是否一谈改良就必然要和打上反动印记的胡适的改良主义挂钩搭线？更值得一提的是，即使在王光祈热衷所谓“音乐救国”之时，他并未稍懈用来教育和启发国人反帝斗争的《近世中国外交史料》的翻译。这岂是甘当洋奴，从不敢触及洋大人侵华丑史的胡适可比拟！9·18事变时，王光祈“卧病异邦，闻此噩耗，百感交集，殆难言喻”。<sup>⑨</sup>接着便赶译《国防丛书》六种，为民族的抗战竭尽绵薄之力。这些都说明，不管王光祈使用的某些方法何等幼

稚可笑，他孜孜以求的目标毕竟是“救国”。作为一个远离故土，而又把绝大部分精力用于治学的专家学者，他不理解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阶级搏斗，但是也拒绝同曾是老乡、同窗、会友的曾琦、李璜等国家主义分子在政治上同流合污。1935年4月，蒋介石曾电国民党政府驻柏林使馆向他转致“如愿回国，当图借重”。<sup>②</sup>他并未应邀相就，这也是事实。这更难与卖身投蒋的胡适之流同日而语。总之，王光祈是一个不宜简单加以评价的人物。他“内蕴甚强”，内心世界是复杂的、矛盾的，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相冲突，辩证因素和形而上学相混杂，而在此种矛盾痛苦的状态始终支持他“孤苦奋斗”的精神力量，却是他矢志不渝的爱国民主主义思想。这也正是王光祈值得肯定之处。

### （三）

王光祈从事史学著译的方法，也很有值得总结借鉴的地方，可惜这方面他言及尤少，我们只能从他著译的史作聊作探究，管中窥豹。

首先给人深刻印象的，是他十分注意“洋为中用”。如利用西洋科学方法来整理国乐历史，利用国外出版的外交史料来丰富近代国史的素材。他固然把西洋“汉学家”对中国学者的轻蔑视为“奇耻大辱”，但却并不因此放弃吸取西方科学研究的长处。例如他编著《中国音乐史》一书，是“欲将整理中国音乐史料之方法，提出讨论，譬如我们计算律管，应用何种物理公式，采用音乐史料，应用何种鉴别方法之类……”这正是取西方科学方法之所长。他认为“西洋学者关于中国音乐历史之撰述数十种……亦多有精到可采，或错误宜正之处。”<sup>⑩</sup>这也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他还努力从事中西文化的交流工作，

与西洋音乐史有关者，他在国内出版的著作就有《西洋音乐史纲要》、《各国国歌评述》、《欧洲音乐进化论》等多种。他也不断将中国古典音乐介绍给西方，如他用德文撰写的博士论文是《论中国古典歌剧》，还在德国刊物上发表过《论中国诗学》、《千百年间中国与西方的音乐关系》等论著，并为1929年的《大英百科全书》和《意大利百科全书》撰写了有关国乐的条目。他病逝异域后，他供职的德国波恩大学东方学院的院长、教授卡勒博士曾在悼词中强调：“他努力介绍西方音乐的精华到中国去，并且应用西洋的方法去整理那至今还未有人碰过的(国乐史)材料；在这一方面，他可以算是第一个先驱者。”<sup>⑪</sup>波恩大学音乐学院院长、教授希德玛博士也说：“他把握住了西欧、特别是德国方面研究音乐的科学与途径，由此设法与他故乡的音乐与戏剧的艺术相接近。这居然给他做到了！”<sup>⑫</sup>

其次，他特别注重第一手史料。象他翻译的七种外交史料，“其材系以当时直接参与该役者之著述为限。”《李鸿章游俄纪事》一书，系摘译自曾任帝俄政府总理的维特(Witte)伯爵的私家笔记。“当李鸿章赴俄订约之时，维氏正任财政大臣；俄皇以其熟东方情形之故，特令彼与李氏谈判，遂订中俄密约。”<sup>⑬</sup>维特在笔记中供认了重金购买李鸿章、张荫桓，取得在满洲的筑路权，强租旅顺大连的种种史实，并不得不承认：“此种强力合并关东之举……乃是一种万分卑鄙之行为”。<sup>⑭</sup>《三国干涉还辽秘闻》，摘译自柏林大学汉文教授佛郎克(O Franke)所著《1894年到1914年列强在东亚》一书。佛郎克“曾任德国驻华译官多年。当三国干涉还辽之际，彼正在中国，是以对于各国当时纵横捭阖情形，所知甚详。”<sup>⑮</sup>《西藏外交文件》一书，收录了自唐代到民国有关

西藏问题的重要文件十三篇，乃译自英人贝尔爵士（Sir Charles Bell）所著《西藏今昔》一书。贝氏曾任英国驻哲孟雄（锡金）政治委员十年，1903年曾随英军侵藏，后任英军所占藏区行政长官，1914年中英藏在印度召开西姆拉（Simla）会议，他又是英方全权代表的西藏事务顾问，1920年还应达赖喇嘛邀请在拉萨留居一年。此人“居于印藏边界者，前后总计十有九年之久，实为英国之‘西藏通’”。<sup>③</sup>王光祈认为“现在藏中一切纠葛，均与此君具有若干关系。”<sup>④</sup>因此，他从贝尔书中摘译出英方所存种种有关西藏问题的条约文件，并参阅《旧唐书》、《新唐书》、乾隆五十七年马少云、盛梅溪合著《卫藏图识》、光绪十二年黄沛翘著《西藏图考》，以及近人王桐龄所著《东洋史》、陈崇祖所著《外蒙古近世史》、佛郎克所著《1894年到1914年列强在东亚》和贝尔《西藏今昔》等书，对各种条约产生的原委和背景加以考察，撰成《译者导言》七章。可以说《西藏外交文件》一书，确实是集诸家之长，而又简明扼要地纵观西藏问题的极好材料和指南。《库伦条约之始末》，系摘译自前俄国驻华公使廓索维慈（Korostovetz）所著《从成吉思汗到苏维埃共和国》一书的若干章节。廓索维慈是俄蒙库伦谈判时的俄方专使，“系手订库伦条约之人，故对于此事经过，言之甚详”。<sup>⑤</sup>至于《拳乱笔记》的作者，镇压义和团运动的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更是恶名昭著。他对八国联军在中国杀人放火、奸淫虏掠罪行的描述，无疑是强盗和刽子手累累罪孽的亲笔自供状。其余两书，即《辛亥革命与列强态度》、《美国与满洲问题》，皆选译自德国政府秘密外交文件，后者“并尝有德皇威廉第二御笔硃批在上。”<sup>⑥</sup>从以上繁琐的叙述不难看出，王光祈所译七种外交史料，确系极有参考

价值的第一手资料。这些材料又多系国外新近出版者，王光祈立即迅速将它们译介回国，他选择史料的见地和敏感确实值得称道。

其三，是他在著译中讲究史料的筛选剪裁和采用史料的严谨。他翻译的七种外交史料，除《瓦德西拳乱笔记》系全书照译，其余皆选译外国人著作中最关中外纷争的部分。如《美国与满洲问题》，系译自1926年出版的《德国战前外交文件汇编1871—1914》之第32册中的第250、251两章，集中了1909—1910年间美国鼓吹“满洲铁路中立化”和日俄签订“满洲条约”之际，“德国外交部与德国驻各国使节的往还电函45件，均系直接反映德国与各列强对这些事件态度者。又如《辛亥革命与列强态度》，也是从1926年出版的《1871年到1914年的欧洲内阁大政》所刊“数十巨册”德国外交部重要文件中，辑译出反映各列强对辛亥革命的态度之文电62件。在浩瀚的西洋史籍中进行寻章摘句的发掘筛选，从中剔取与近代中国关系至切的史料译而成书，还要使读者“不仅对于已往史迹，完全瞭然，即对于现在局势，亦将由此有所领悟也。”<sup>⑦</sup>这不但需要付出极其艰巨的劳动，而且要有明鉴史料价值的慧眼，事实证明王光祈在这两方面都是相当出色的。另外他使用史料也极严谨审慎。编著《中国音乐史》时，“郑觐文君之‘中国音乐史’，材料亦甚宏富，可惜多未注明出处，是以不敢尽量采用。”<sup>⑧</sup>翻译外交史料时，尽管他的译笔在“信、达、雅”方面皆属上乘，然而每遇重要段落，例如当事人关键的原话，重要的文件、条约，无不将外文原文附列于后，以与译文相校。对译作中偶出的小疵，他诚于聆教，律己甚严。如翻译《西藏外交文件》一书时，他由英文原著转译乾隆御制《十全武功记》出现了一些误译，史学家

邵循正先生撰文批评，他即坦率承认“其为译学界空前之大笑话。”表示若该书再版，定“将《十全武功记》原文刊入，并志先生指导之厚意。但拙译之文，仍将令其继续保存，毫不删改。一则用以纪念鄙人孤陋寡闻之过；二则用以证明一国文字，若经再三转译之后，将与原文面目相差至何等地步。”<sup>②</sup>这种实事求是，闻过即改的严谨作风，已不仅仅是治史方法的问题，它也充分体现了王光祈高尚的史德。

应该承认，王光祈涉及史学的著译不仅数量可观，同时也具有较高的史学价值。象他的两卷《中国音乐史》，首开了运用现代科学方法整理国乐史的先河，在我国近现代音乐史上的地位是无庸置疑的。该书自三十年代出版以来，解放前以两种版本各出三版，解放后由音乐出版社重版一次，版本之多，恰恰说明它有极高的使用价值。他的《东西乐制之研究》，1958年曾由音乐出版社重版，而《论中国古典歌剧》，1982年才由德文转译过来，载于文化艺术出版社编辑的《音乐学丛刊》上。但他在中西音乐史方面的多数著作，犹未重版或被介绍，这直接影响到对这些著作价值的认识和评价。

他所译介的《中国近世外交史料》各书，由于是帝国主义侵华活动的原始记录和自供状，史料价值极高，出版后到一直颇受国内史家看重。曾对他质难的邵循正先生当时就承认，他“时就欧陆新出外交之材料，钩玄提要，以利国内学子探讨，则国人受惠实多。”“国内读先生书者众”。又称“先生著作甚富，脍炙人口……先生学行之笃，远非时辈所及，仆聆之神往”。<sup>③</sup>这是发自内心的中肯评价。建国以来，史学界不大提及王光祈的名字，然而对他翻译的外交史料各书，实则仍大量引用。据笔者近期在仓促中作的粗浅调

查，这些史料利用率之高，仍居国内同类材料前茅。他译的七种史料中，计有《瓦德西拳乱笔记》被大部辑入中国史学会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的《义和团》第三册；还有《辛亥革命与列强态度》，被全书载入同一丛刊的《辛亥革命》第八册。它们和其余各书，均被现代国内史家广为引证。例如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近代中国史稿》，引《瓦德西拳乱笔记》7处，《库伦条约之始末》3处；由山东大学、北师大等校历史系编写，中华书局1979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史》，引《瓦德西拳乱笔记》6处，《库伦条约之始末》5处，该书1983年第三次修订本，犹引《瓦德西拳乱笔记》5处；吉林师大历史系编写的《沙俄侵华史简编》，竟引《李鸿竟游俄纪事》9处，《瓦德西拳乱笔记》1处，《库伦条约之始末》17处；1982年出版的胡绳同志所著《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也引《瓦德西拳乱笔记》4处。此外，一些在史学界较有影响的著作，如刘大年著《美国侵华史》，章开源、林增平主编的《辛亥革命史》三卷本下册，陈旭麓主编的《近代中国八十年》，以及廖一中、李德征等人编著的《义和团运动史》，李宗一著《袁世凯传》，北大历史系所编两卷本《沙皇俄国侵略扩张史》，也都不同程度地采用了王光祈所译史料。至于在有关列强侵华活动、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及中印边界问题等方面的学术论文中援引上述史料者，更不胜枚举。这表明王光祈的史学著译，迄今仍有较强的生命力，有很高的使用价值。

综上所述，我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王光祈之著译的史学价值是高的，他对中国近代史和音乐史研究的贡献是大的，他卓越的爱国史学家的地位也是不应该忽视的。这方面事实俱在，只是研究评价还相当不足。笔者希望这种情况不久将

能得到改变，希望王光祈的史学著作重新再版或被广泛介绍。终身坚持爱国主义的王光祈，无论作为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杰出的音乐学家和卓有贡献的历史学家，都应该在中国新文化史上居应有的一席，他确实值得我们尊敬和纪念。

### 附注：

①⑥⑦周谦冲：《王光祈与现代中国文艺复兴运动》载成都《追悼王光祈先生专刊》1936年4月19日出版。

②李安和：《近代中国音乐学先驱者——王光祈》载台湾《全音音乐文摘月刊》1977年10期。

③《论中国古典歌剧》，1934年日内瓦中国国际图书馆出版；《论中国诗学》，载1930年法兰克福（中国学院）科学导报；《千百年间中国与西方的音乐关系》，载1935年（波恩大学）卡莱教授纪念专刊》。

④⑤李劫人《诗人之孙》载成都《追悼王光祈先生专刊》。

⑦倪平欧《光祈北平生活之一段》载成都《追悼王光祈先生专刊》。

⑧孟寿椿《五四时代王光祈先生的奋斗生活》载成都《追悼王光祈先生专刊》。

⑨周太玄《王光祈先生与少年中国学会》，载成都《追悼王光祈先生专刊》。

⑩⑪⑫⑬⑭⑮⑯王光祈《中国音乐史》自序，中华书局1934年版。

⑰⑱⑲⑳㉑㉒王光祈《与邵循正书》，载《旅德存稿》中华书局版第四册681—682页。

⑳㉓《田中义一上日皇奏章》，载《时事月报》一卷二期，1929年12月出版。

㉔㉕魏嗣奎《我所能记忆之光祈生平》，载

成都《纪念王光祈先生专刊》。

㉖㉗王光祈《辛亥革命与列强态度》译者序言，中华书局1929年版。

㉘㉙王光祈《美国与满洲问题》译者序言，中华书局1928年版。

㉚（清）章学诚《文史通义·书教下》。

㉛王光祈《德国特约通讯》，载《申报》1923年10月15日。

㉜王光祈《西洋音乐史纲要》，中华书局1937年版1—2页。

㉝王光祈博士论文《论中国古典歌剧》附录《我的简历》，载《音乐学丛刊》文化艺术出版社1982年第2期。

㉞李新、陈铁健主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第一册《伟大的开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44页。

㉟王光祈《东北问题与国际形势》，载《旅德存稿》第二册第298页。

㊱王光祈《中国音乐史》上卷2—3页。

㊲㊳《王光祈先生纪念册》，上海文海出版社1936年12月版。

㊴王光祈《李鸿章游俄纪事》译者序言，中华书局1928年版。

㊵同㊴，第97页。

㊶王光祈《三国干涉还辽秘闻》译者序言，中华书局1929年版。

㊷王光祈《西藏外交文件》译者序言，中华书局1930年版。

㊸王光祈《库伦条约之始末》译者序言，中华书局1930年版。

㊹《邵循正答函》，载《旅德存稿》第四册682—683页。

### 学术动态

## 四川省美学学会将经常举行小型讨论会

为活跃学术空气，交流美学研究中的新信息、新情况，探讨新问题，四川省美学学会决定经常举行小型的美学专题讨论会。第一次讨论会，于今年一月六日在四川大学举行，与会者三十余人，对“美的本质”问题进行了探讨，并确定，今年四月在四川师范学院举行第二次讨论

会，着重探索怎样以新的方法及途径去研究“审美关系”、“审美属性”的内涵。到会的学会常务理事同时决定，今年秋将与省文艺理论研究会联合在川东召开年会，重点探讨文艺学、美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何志华）